

从文学叙事到文化记忆：中越跨境族群 宋珍故事的互文性阐释

黄 玲(壮族)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京族喃字叙事长诗《宋珍歌》、越南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与越南汉文《宋珍新传》三个文本的比较分析，以文化记忆为理论视域，结合中越宋珍故事的口头传说、字喃文本、仪式展演、民族运动、民间信仰等文化文本进行互文性的释读，从中观照跨境族群的历史心性与文化认同。宋珍故事讲述了中越跨境族群的族群叙事与历史记忆，成为今天中越两国共享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跨境族群 京族 越南 文化记忆 互文性

在中越文学交流史上，经由越南文人对中国文学进行移植、耦合和改写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尤为可贵的是，其中一些经典民族文学又随着族群的迁徙回到中国土地，成为中越跨境族群的文化记忆。中越两国共有的宋珍故事，是跨境族群历史文化的丰富叙事，如今依然在中国京族“哈节”和日常生活中活态演绎，不仅保存了中越两国被遮蔽或遗忘的族群历史与民间文化，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元蕴含。

宋珍故事：中越跨境族群的共享遗产

（一）唱哈经典与喃字抄本《宋珍歌》

在中国广西沿海地区生活的京族，流传着一首叙事长诗《宋珍歌》^①，它既是传统哈节“唱哈”仪式^②必唱的经典，还作为日常生活的故事讲述。根据民族学者到京族展开民间文化调查的结果显示，宋珍故事现存两种形式，一是叙事长诗《宋珍歌》的喃字歌本，在哈节“哈亭”里演唱，保留了较为真实的表述传统；另一种是民间故事的形式，在京族民间有《宋珍与陈菊

① 陈增瑜主编《京族喃字史歌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18-680页。

② 哈节是中国京族传统节日，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哈”是京语，汉语意思为“唱歌”之意，哈节也被称作“歌节”，京族满尾村的哈节定在农历六月初九至十五日。见周建新《从边缘到前沿：广西京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花》^①和《东辛与三妹》^②等异文,这些民间故事是由民间文学调查组到京族地区调研时,相关学者在地方民间根据口头传述进行的记录与整理,有一定的文学加工成分。

喃字抄本《宋珍歌》不仅是一个以喃字为载体的固化文本,还在京族民间活态传承。以此为线索,我们得以打开京族文化的记忆之门。长诗的传唱者苏锡权回忆了喃字抄本《宋珍歌》的形成过程,在他最初的印象中,京族《宋珍歌》是以口头传唱的方式流传,在他年轻时由岳父阮其福传授并教会他用喃字把唱词记录下来,写成“喃字歌本”。后阮其福将这一喃字歌本送给苏维芳。50 年代,山心岛的范仲芳向漓尾岛苏维芳借去歌本并保存下来。1980 年苏锡权得知此歌本尚存,就借来再次抄录后传给了儿子苏维光。^③照此推算,1985 年民间文学调查组到漓尾岛时苏锡权已有 85 岁高龄,因此《宋珍歌》在京族三岛流传可以追溯到清末即 19 世纪后期。从口头传述到喃字写录,从漓尾岛到山心岛,《宋珍歌》绵延不绝。

那么,为何《宋珍歌》是选用喃字来录写?据相关学者统计,喃字多运用在京族族谱和宗教经书中,在 20 世纪末期京族地区懂得书写和阅读喃字的总共才 7 个人,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者,他们成为了族群记忆的守护者。2002 年,京族民间知识分子苏维芳再次整理《宋珍歌》喃字手抄本,让世人看到《宋珍歌》的喃文原貌。^④当“喃字”进入人们的视野,《宋珍歌》与越南民族文化的潜在关系就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中国京族与越南越族在族源上的渊源关系,已取得学界共识。在 16 世纪以后,越南一部分越族人在海上捕鱼,随海风飘到现今的京族三岛,出于生计所需而定居下来。这些人群多来自越南的涂山、春花、宜安、瑞溪等地,陆续迁入我国境内形成了今天中国的京族。^⑤再往前追溯,现今中越两国的京族人又是由骆越族群与周边民族融合而成。京族的民族语言,即京语,属越南语北部方言,除个别词语及一些外来新词汇的读音略有不同外,京语读音与越南语基本相同。漓尾村民间宗教的经书以及一些民间唱本中曾流行一种被当地人称作“字喃”的文字,“字喃”即“喃字”,是越南古代创制的民族文字。在京族,喃字使用并不普遍,主要是民间宗教人士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带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喃字用来记载族谱,流传下来的“唱哈”的歌本多为喃字所录。2002 年,苏维芳经过广泛搜集与潜心整理,喃字本《京族唱哈全集》面世,^⑥《京族唱哈全集》一书中附上了这些京族史歌的汉语译文,喃字与汉文互为参照,

①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委会编《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② 陈增瑜主编《京族喃字史歌集》,第 443~449 页。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写组:《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年,第 35~37 页。

④ 周建新:《从边缘到前沿:广西京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第 190 页。

⑤ 同上,第 15 页。

⑥ 周建新:《从边缘到前沿:广西京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第 190 页。

有利于学者研究与对外宣传。

(二)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与汉文书《宋珍新传》

爬梳越南文学史,喃字在越南民族文学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写意,不仅为男性文人普遍使用,涌现出了许多的经典文本,如《金云翘传》(阮攸)、《花笺传》(阮辉嗣)、《传奇漫录》(阮屿)等,还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成为女性钟情的话语表达,出现了段氏点等才华心性都卓尔不凡的女诗人。以喃字为载体的“喃诗传”,也成为了越南民族文学之经典文体,是依越南本土“六八体诗”的叙事传统来搭建文本结构,以讲唱表演为表述方式,内容主要包含英雄事迹与男女情缘两种类型。^①这些作品的题材大多取材于中国的民间故事和俗文学,在越南经过民族化改造后成为越南民族文学经典,例如《二度梅》《石生传》《芳花》《潘陈》《宋珍菊花》《范载玉花》《范公菊花》《李公》《女秀才》《观音氏敬》《南海观世音》《徐识》《碧沟奇遇》《贫女叹》《黄绸》等,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赫然列于其中,^②作者佚名,应是历代累积、集体创作的结晶。

有学者在对越南遗存的汉喃文献进行书目辑录时,发现越南本土存有一个汉字文本的《宋珍新传》。据《越南汉喃古籍文献提要》之“小说·诗传”一类所载,《宋珍新传》(Tong Tran Tan Truyen)辑录如下:

今存抄本一种,110页,高19.5公分,宽13.5公分。关于宋珍、菊花故事的六八体诗传,广盛堂印于维新八年(1914)。此书讲述寒士宋珍与富家女菊花相知相爱,宋珍中状元后,拒绝公主求婚,辗转十余年,与有情人成为眷属的故事。汉文书。^③

从记载可知,该本《宋珍新传》一书印制时间是1914年,抄本,用汉文书写,现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

之后笔者曾托越南学者按图索骥,寻找汉文本《宋珍新传》,未果;也未找到于在照在《越南文学史》中提及的越南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但却意外地找到了一本喃文的《宋珍新传》,封面上书“印于广盛堂维新八年(1914),越南广盛堂藏本”。现笔者所据有的就是此本喃文书《宋珍新传》的复印本。笔者到京族地区调查,苏维芳曾将笔者在越南汉喃研究院复印的喃文书《宋珍新传》与中国京族长篇喃字叙事诗《宋珍菊花》进行比对,发现两书在主要人物故事和篇章结构上大致相同,只有词句用语之区别。苏维芳推测,这与喃字多为汉字记音的特征有关,换言之是相同的读音因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字来记音而造成了遣词造句的差别。由

① 王小盾:《〈越南汉文小说丛刊〉和与之相关的文献学问题》,《中国文哲研究辑刊》2001年第4期。

②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北京:军谊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

③ 刘春银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889页。

此可见,宋珍故事在越南的流传情况。

中越跨境族群(中国京族-越南越族)有关宋珍故事的异文非常丰富,其中喃字叙事长诗《宋珍歌》(中国京族),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越南)与喃诗传《宋珍新传》(越南)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文本存在,也汇成累积的文化记忆。那么,这三个文本间的渊源关系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后文本对前文本发生了怎样的衍化?凸显出哪些具有历史感和地方感的族群历史和民族叙事?

首先,从文本形成时间来梳理。越南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的成书时间未有明确记录,但我们可以将其置放在越南历史的整体语境中考察。喃字是一种根据越南语音、借用中国汉字造字法来创制的文字,与口头传统有着紧密关系。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上半叶,越南国内兴起一股用喃字进行创作的风潮,喃字作品大量涌现,其中包括大量无名氏创作长篇叙事诗。以喃字文学的发展历史为参照的坐标系,我们大致可推测《宋珍菊花》出现的时间也在同一时期。其次,从越南文学发展及文体形式的演变上看,是先有诗歌形式的叙事喃诗,才出现了性质与小说近似、集中描写人物事迹的“喃诗传”。喃诗传也称为“国音传”,采用的喃文诗体形式的事迹传,换言之,先有喃字长篇叙事诗《宋珍菊花》,才出现由喃字转换为汉文的诗传《宋珍新传》。有学者通过越南遗留下来的古籍文献进行甄别考证,认为喃诗传是在叙事喃诗的基础上,受中国章回小说的影响,加大了叙事成分而形成新的文体,而且由于以男女情缘的婚恋故事为题材而带有鲜明的世俗色彩和民间性。据中国学者王小盾介绍:“六八体是一种有浓郁乡土特色、宜于叙事、较富说唱风格的诗歌体裁,也是常用于通俗宣唱和陶娘之歌的体裁……贴近口语和口头传播方式的体裁,是汉诗和越南民间说唱相结合的产物。”^①再者,虽然宋珍的人物和故事都有中国原型,^②但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学形象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以宋珍和陈菊花名字相同的人物和事迹;越南汉文书《宋珍新传》虽用汉文书写,但可以确定这一文本不是中国民间或者文人的创作。鉴此,《宋珍菊花》大概出现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此后《宋珍菊花》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民众的集体智慧使其活态传承,并在叙事结构和内涵上不断丰富、扩展,形成了蕴藉深厚的具有史歌性质的民间叙事文学。越南出现了很多作者署名缺失的喃诗传,这或与黎朝后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汉字的官方地位而人为压制喃字文学有关。关于越南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大量汉文刊刻书籍,后文将加以论述。

越南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已然呈现出相对成熟的文学形态,相较而言在形成时间上早于中国京族的长篇叙事诗《宋珍歌》。京族《宋珍歌》的喃字文本

① 王小盾:《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序”,见刘春银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

② 参见黄玲《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民间叙事文学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

是以阮其福传唱的叙事歌为底版经苏锡权、苏维芳等人用喃字写录整理而成，由于京语与越南语的同源同质的关系，也印证了中国京族《宋珍歌》来自越南。

文化记忆：历史反思与国家认同

（一）文化记忆理论与互文性阐释

中国京族从越南飘洋越海来到中国，而越南历史上与中国骆越文化、汉文化有着深远关系，我们对其探讨不能仅仅止于时间层面的先后定位，更应该深入其族群历史文化的复杂层面，方能把握其文化原型与传统景深。宋珍故事作为中越跨境族群共享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前文本与后文本、中国文本与越南文本的影响与接受，还体现为文字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凝缩与扩展。诚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我们不能把互文性仅仅理解为以不同强度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对前文本的参阅策略，还应该把他理解为能够表达文学作品的与特定前文本之间关系的一种概念，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文本参与文化领域的标志”。^①也就是说，能把文学研究导向深层必需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语境有所沉浸与参与。因此，对于具有集体创作或历史累积之特征的民间叙事，我们需要走向广阔的文化场域，回向历史的悠远记忆，来参透与领悟其深邃的蕴藉。

文化记忆理论，最初源于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文化记忆”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的，这一概念旨在指涉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因文学叙事常常被作为记忆的重要表述媒介，“文化记忆”逐渐被广泛使用于文学研究。记忆作为一种个体心性与集体意识的认知功能，是人类对刺激生命的各种信息进行感知、选择、内化和传递的复杂活动。蕾娜特·拉赫曼指出，写作是一种记忆行为并且由于文本的相互干涉产生了文学的记忆功能。由此引发了文化记忆与“互文性”之关系的认识。可见，文化记忆理论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特性。

（二）“家”与“国”：历史反思与国家认同

越南的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和汉文诗传《宋珍新传》与京族喃文叙事长诗《宋珍歌》，这三个文本虽然故事框架、人物原型近似，但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域间流传，不同的文化语境使得跨境族群在进行族群表述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记忆与历史选择，使得故事显现出不一样的叙事内涵和精神内核。

京族《宋珍歌》讲述读书人宋珍和民女菊花的婚姻家庭生活，与表现家庭伦理的《金钗

^① 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0页。

记》《唱文龙》等中国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的题材相近,甚至借用了中国的状元故事、节妇故事、孝子故事等故事原型。^①可以说,《宋珍歌》的整个叙事主要由中国俗文学与民间故事的母题耦合而成;但叙事内部的情节组织充满了民族化的聚合与张扬、演绎与创造。叙事长诗《宋珍歌》不局限于个体小家和个人情感,而是在男女情感婚姻生活的主线贯穿下,大至国家、小到个体,众多叙事在长诗结构中推演、延伸和扩展;而且叙事随着社会发展、现实变化糅合了民间、文人、国家的多元话语。这三套话语时而重叠分离,时而碰撞合流,激发出京族民众更具主动性和自我意识的文学表达。因此,以文化记忆为理论视域,对《宋珍歌》这一中越跨境族群共享的文化遗产进行互文性文化阐述。

恰是此种“互文性”的文本叙述、文化记忆的符号象征以及人类学的文化构成,形成了一种中越跨境族群的反思与互动。诚如威廉·福斯卡姆普所认为的,文学文本不仅把互文性作为文本生成的特征,更多的是寻求通过多种多样的互文性联系来达到高度的自我反思,^②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的影响、叠合、互动的共生方式,有助于一个族群在文化文本生成过程中重建族群的历史、社会和性别关系的网络结构。借助在中国京族依旧活态传承的《宋珍歌》,我们能够对京族的历史心性有所了解,对越南的文化历史有所反思。

如前所述,与中国的活态传承与仪式展演不同,越南有关宋珍故事喃字诗传仅有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的一两个喃字或汉文抄本,与越南文学史的记录和评价的情况极不相符。但此种“不在”的在场,恰是一个悬置的问题,引发我们通过京族《宋珍歌》进行追溯与反观,来达成对 18 至 19 世纪越南社会之文学想象与历史现实的观照与反思。

纵观《宋珍歌》,贫家子与富家女的爱情婚姻依旧作为故事主线,但爱情并非叙事的核心,而是倾向男女主人公在缔结良缘后如何维护家庭之圆满的过程:由最初的宋珍进京科考,到国王招婿不成将宋珍发配异域;菊花在家的辛勤操持与反抗逼婚;故事对宋珍出使秦国十年的遭遇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铺陈;十年期满宋珍回国,治理家乡,秦国公主倾慕并追随宋珍返乡;最后宋珍菊花历尽艰难,凭着坚定的意志和生活智慧,迎来团圆之幸福。故事的叙事框架中,“家”与“国”是两个遥相呼应的文化意象:地理空间上“家园”与“异域”的相隔遥远,置换到社会层级则是“家庭”与“国家”的等级差别。《宋珍歌》的叙事核心是“家庭”,并以“家庭”为基点,展开“家庭”之上“国家”与“家园”之外“异域”的想象。

饶有意味的是,“国”在《宋珍菊花》的叙事中出现了“越南”与“秦国”两个国家的形象。在宋珍的表述中,“越南”是本国,描述相对简单,不仅揭露了越南封建统治阶层的黑暗、昏聩,

① 参见黄玲《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民间叙事文学为例》。

② 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第 262 页。

也真实表露出越南民众对本国统治者的失望与抱怨。

随着故事的发展，“秦国”（中国）形象出场，秦皇对越南使节宋珍设置了层层考验，宋珍或是机敏、或是智慧，甚至是本性的真实流露，将这些考验难题一一化解。秦皇被塑造为一个重视真才实学、不欺辱小国的贤明君主。而秦王的开明豁达、爱民如子，在长诗中构成越南封建统治阶层的一个否定性镜像，显示出中国儒家思想对越南历史文化的深度浸染。

在《宋珍歌》的民间叙事中，民众对以越皇为代表的权贵持以批判和否定，而民众没有直指越皇的暴虐，而是通过对异域国家之贤明君王的想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与愿望。《宋珍歌》蕴藉着民间叙事所特有的斗争精神，可以说，这是民众阶层与权力阶层对话的策略。同时，通过主人公宋珍所展现的聪慧才识与自主意识，从而巧妙化解“家庭”“国家”的矛盾，展示出跨境族群的文化自信以及对“秦国”的文化认同。由此，通过对《宋珍歌》深入解读，通过对中越跨境民族——京族所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重拾与反思，我们能够真实触摸越南民众不同历史阶段的家国意识。

因篇幅所限，对宋珍故事的文化阐释另文论述。概而言之，宋珍作为跨境族群的文化无意识和集体想象物，其身上彰显着自信与自觉的民族精神与自我意识。由此可知，中国京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位处边缘的跨境族群，其民间叙事既承担着历史记录和文化记忆的功能，也体现出寻求国家认同的精神诉求。

文化传承：族群叙事与维新运动

（一）中国京族史歌：历史叙事与文化实践

通过追溯《宋珍歌》之文学题材的中国来源与跨境传承，解读其文化内涵的流传变异，我们可以对中越跨境民族的族群历史和精神心理获得真切的感知。

喃字文学叙事长诗《宋珍歌》以韵文形式口头传承，作为每年哈节必唱的经典长诗，为京族建构了一个立体生动的文化空间。《宋珍歌》关乎京族民间社会与民众生活、关乎人情伦理与道德审美，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生动演绎和活态传承。遗存的喃文书成为中越跨境族群（中国京族—越南越族）共享的文化遗产，不仅是越南喃字的活态传承，还印证了中越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以及跨境族群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自觉。因为韵文形式的稳定性、传播载体的书面化和演唱场合的神圣化，其保留的文化因素和叙事内涵相对要更为丰富和恒定。所以，《宋珍歌》在每年哈节的哈亭长响不衰，在家庭祖辈的淳淳传述中延绵不绝。

近年来，随着京族喃字文化抢救与挖掘工作的展开，人们发现“喃字”在京族民间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蕴藏：既有散文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有韵文类的史诗、歌谣、祭词祷语，格

言谚语,合起来有几百万字之多,可以说喃字文化包含了古代京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京族民间就代代流传着迁徙传说叙事歌。^①这些叙事歌以韵文形式吟诵,所以即便是口口相传也较为稳定完整地保存着原初信息。随着从祖辈传习下来的袅袅余音,唱哈仪式成为京族传统的信仰仪式和祖先的历史记忆,唱哈经典《宋珍歌》则成为京族祖先漂洋过海的历史叙事与民众开创家园的社会展演。

(二)越南维新运动: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

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古代作品和民间叙事,并不都是落后于时代的,有些反而因其所蕴藉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而成为族群的深刻印记,同时也可将传统文学发展为具有时代特征和社会担当的文化事象,成为民族国家的叙事强音。在现今越南,拉丁化越南文成为通用文字,“喃字”也与汉字一样,鲜有人懂。但要对越南历史文化有深切的认知与体悟,必不可绕开汉字与喃字。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京族喃字叙事长诗《宋珍歌》的聆听与解读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地复原越南喃字文学的历史本相与社会民生。

从现今所存《宋珍新传》的刻印时间——维新八年(1914)来看,此时正值越南民族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东游运动”轰轰烈烈展开。^②越南东游运动反抗殖民侵略,倡导民族独立,传统文学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叙事成为革命的精神武器。在越南民间,一股用汉字和喃字书写和刊刻书籍的潜流悄然涌现。最初的《宋珍菊花》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出现,到汉文《宋珍新传》印于维新八年(1914),这中间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风雨,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民众精神都会在时间的浩浩长河冲击下发生改变,因此文学叙事的变异就会自然发生。对于汉字抄本《宋珍新传》,因为没有亲见文本,其间所蕴含具体叙事尚不得而知,但在书写字体上选择传统的汉字或民族化的喃字,而非拉丁化的现代越南文,其中深意昭然若揭。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民族书写文字的变换,预示着文化巨大的转向。在越南,由汉字到拉丁化越南文的变换是强制性的。而历史上越南使用汉字,是为汉文化吸引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在法国殖民越南时期,清除汉字,禁用喃字,以此强制推行拉丁化文字。在政治和文化殖民的双重氛围中,越南民间出现汉字或喃字印刷的文学作品,除本文要论述的《宋珍新传》外,还有阮廷照《蓼云仙》(*Luc Van Tien*)、无名氏《河城正气歌》(*Ha Thanh Chinh Khi Ca*)和无名氏《河城失守歌》(*Ha Thanh That Thu Ca*)等等。可见,传统汉字和民族化喃字成为越南民众抵

^① 陈增瑜主编《京族喃字史歌集》,第 52~59 页。

^② “东游运动”是越南民族的维新运动,源于法国及西方殖民势力在 1858 年发动的侵略战争,时间从 1905 年到 1909 年,由越南民主义士潘佩珠发动和领导。潘佩珠是一位汉文造诣深厚的知识分子,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也深受中国变法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并与孙中山的国民党新政府关系密切。1912 年 2 月,潘佩珠在广州主持成立越南光复会。中国文化成为潘佩珠开展反法救国斗争的思想资源。

抗殖民统治的一种文化策略和斗争手段,负载着保护文化传统和进行精神维新的双重使命。宋珍故事,无论是喃字文本抑或汉字文本,都昭示着在反殖民时期中越两国的共享历史。

概而言之,宋珍故事作为中越跨境族群共有的族群叙事,在文化传统中不断获得激活和再生,从而形成一种活态传承之家园遗产。我们以京族喃字叙事长诗《宋珍歌》为引线,勾连越南的六八体喃诗传《宋珍菊花》和汉文诗传《宋珍新传》等相关文本进行互文性的观照,是尝试着在文学研究与文化记忆的探讨之间进行打通,展现跨境族群民众如何经由文学的符号、原型、修辞、结构,来组合和构建族群叙事和记忆话语,力求唤起中越跨境民族的民间生活与情感,从而展现被遮蔽或遗落的中越民族的文化交往和精神建构。这或许能在材料和学理上对中越跨境族群的文化关系获得深层发现,也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达成文化整体性的观照。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文化记忆与文化实践:中越宋珍故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4M561860)阶段性成果。

(黄玲,百色学院、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刘大先】